

韓江學刊

其他研究

非遗节庆化的案例

——高雄左营城隍文化传承

邓文龙*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强调需保护的价值，节庆是生活的乐趣，文化产业是中华文化遗产的另一种面貌，这三者结合可以创造多赢。作者多年观察，调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今以台湾左营城隍文化传承作为案例分析，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转换、传承与推广。

关键词 节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传承 文化创意产业

一、台湾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

(一) 无形文化遗产

维护无形文化的观念与时俱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 2003 年通过《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追求文化多样性，持续尊重人类的创造力，于 2006 年开始生效。各项“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又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签署 2003 年公约的缔约国提名，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辖下的委员会审查、列名。从 2009 年，在阿布扎比大会中公布了第一批无形遗产名录，截至 2021 年，有来自

*邓文龙，博士，文藻外语大学历史文化观光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Email: 78008@mail.wzu.edu.tw

139个国家的629个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分列三种名单^①：

1. “人类无形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整合了2008年以前的90项“人类口述和无形遗产代表作”，目前累计共529项。此名单是指各小区、群体或个人视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与文化展现。

2. “急需保护的无形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有71项在小区或团体努力之下仍受到极大威胁的无形文化遗产，缔约国承诺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并有资格获取国际财务援助。

3. “最急需保护的社会实践名录”

共46项，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范例，希望藉此提高公众对保护无形遗产的认识。

根据2003年公约，无形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类：

1. 口头传统的表现形式，包括作为无形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 表演艺术。
3. 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
5. 传统手工艺。

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类，非遗节庆化的案例：左营城隍文化传承。

（二）节庆

在中国文字里，“节”最早的意义是指物体的段落之间的连接之处。“节”既是事物一分为二之处，又是二而连一之处。节日，

^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Browse the Lis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gister of good safeguarding practices) 数据取自：<https://ich.unesco.org/en/lists>

也具有相同的特征。节日是有周期性的，它们周而复始，年年重复的把每一年的漫长日子划分出不同的岁时阶段。中国人的民俗节日与节日文化（包括了节日来源的典故、节日前后的仪式、饮食习俗，以及祭祀对象等等），被视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与文明发展过程的象征。相较于外国，中国人本就是爱过节的民族。农业时代的节庆配合着 24 节气，提醒播种收成、夏露寒霜，以及家族的团聚。“节”，成为一个丰庆、欢乐、齐聚一堂的族群文化活动。在工商社会里，“节”，更因为汇集人气，易形成事件、话题，而成为政、商、文化艺术的推广媒介。因此“文化节”、“艺术节”便成为时代的产物。

文化节庆上，人们与种种国粹亲密接触，可以聆听各种美妙的音乐，可以观赏好看的戏剧与表演，在流光溢彩的影像中展开思绪，在异彩纷呈的节目上流连忘返……

走进节庆活动，就是走向一个民族最真实、最感人的内部，在那里可以发现薪火相传的文化具有张力和韧性，也可以感到人类生命繁衍，激情点燃了智慧，智慧催化了力量。

节庆是探讨文化议题的重要题材。在历史性上，一个有历史的城市是最耐人寻味的，同民族、同时代的思想 and 建筑形式与当地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共生现象，但反映出的历史，也记载城镇的生活。在文化性上，历史古迹的建筑布局和型式风格所反映出的深层文化内涵，是地方文化资源特色的所在，都可能成为发展观光旅游活动原汁原味的文化素材。因此，结合当地资源举办的文化节庆活动，仅可宣扬地方文化，兼具经济效益，如国际知名历史城镇文化节庆——英国爱丁堡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从 1947 年开始，该节庆不是单一艺术节庆，而是整合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丁堡艺穗节、爱丁堡电影节、爵士蓝调音乐节、国际书展及军队分列式等节庆，以前二者规模最大，也充满对比。国际艺术节以大众化表演为主，艺穗节则以非主流创作表演为号召，现已俨然成为国际历史城镇文化节庆之典范。所以城市的文化节庆建构方式，关系到地方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建筑艺术等文化保存，以及地方发展与地方行销。

高雄地区的开发自明郑起，之后大量大陆移民渡海来此地，不同族群分地而居，早期风俗习惯延续自大陆的意味浓厚，所谓“泉之俗行于泉，漳之俗行于漳”，即可了解当时原乡文化移植到高雄的情况。古代人们为适应大自然，提高农耕收获，在长期的农事实践与经验累积中，结合了天文与气候、农业气象的经验所创设出来的 24 节气，其源自于黄河、长江流域，对处于低纬度的海岛气候台湾，并不尽然适用，且台湾虽小，各地气候却有差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差异。高雄地区就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不断推移的适应下，逐渐形成了节俗活动“当地性”与新兴节庆的特色，在饮食文化上也呈现出“南北性”的特征。

本文认为高雄节庆有四种型态：传统庆典、民俗庙会、原住民祭典与新兴节庆等型态。传统庆典来自于天地节气或是远古的传说传统生活节奏的岁时节仪，目前仍旧盛行于台湾民间。人们冀望能通过对神明和祖先虔诚祭祀，求得一生保佑与平安。所以社会仍一直延续着“每逢佳节必有社庆”的习俗，让在现代社会日渐疏离的家族成员也得以借着共同的记忆，团圆过节、凝聚亲情。民俗庙会是汇聚先民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的经验，日积月累地发展成为民俗文化的特色。自古以来的传统节庆，更是蕴藏着动人、深刻、发人深思的神话故事，为这些传统节庆增添不少教育与缅怀的意义，呈现出浓厚的文化精髓与人文特色。民俗庙会，随着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的代代相传，受到地域或环境变迁的影响，而衍生出如今深具地方特色的台湾风俗，在历史文化遗产与人们精神生活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高雄，由于庙宇遍布与宗教活动的兴盛，举凡神佛诞辰、建醮祭祀或安灵祈福，都会举行热闹的庙会活动，并依据各方供奉背景、神像渊源，或是信众祖籍等因素之不同，而各自呈现同中求异之习俗与特色。原住民祭则留了传统文化，呈现原住民与自然共存、拥抱大地万物的生活型态。新兴节庆，则是现代各地方从小区营造到结合当地文化特色、自然资源、休闲产业的新兴活动。节庆活动则具有许多功能，不胜枚举，如提供信仰心灵寄托、保存传统艺文文化、教育意识倡导、形象塑造、各种商品促销、小区营造与凝聚、地方经济开发、观光开发与增加

观光效益、增加当地的观光收入、发表民众的成果、联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供专业人士参观研究、提高活力与能见度等功能。

高雄民间的岁时祭典，几乎都以寺庙为活动中心，由于民间祈福、酬神谢恩的意愿，使得寺庙祭典无不极尽铺张，热闹非凡。以往在祭典活动期间，常有各种民间游艺表演，十分具有传统民俗风味，颇具宏扬传统文化的功能。但目前各地寺庙的祭典活动，其表现形式则日渐创新，如举办赛会、猪公比赛等，其他现象如庙庭前装置电动祭坛与雷射灯棚，游行队伍更是花招百出，甚至伤风败俗的色情表演也纷纷出笼，标新立异又低劣粗俗，使原有纯朴的民族宗教活动面临本质上的改变，大有走向综艺化、商业化的趋势，将有损于宗教信仰的严肃性与社会功能，有关主管机关应予重视。

有关高雄地区重要节庆如下表 1:

表 1: 高雄地区重要节庆

类别	名称
传统庆典	高雄灯会、端午龙舟、中元节、祭孔大典、重阳节
民俗庙会	城隍绕境、妈祖诞辰、王爷诞辰、义民庆典、关圣帝君圣诞、三太子庆典、文昌帝君祭等神明圣诞、左营万年季、狮甲艺术季
原住民祭典	高雄市原住民联合丰年祭
新兴节庆	高雄国际钢雕艺术节、高雄国际货柜艺术节、高雄春天艺术节、高雄电影节、高雄设计节、高雄啤酒节、高雄夜合客家文化艺术季、爱河木偶戏展演祭、好汉玩字节

(数据源: 研究者整理)

(三) 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概念，首度出现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1947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启蒙的辩证》一书中。

“文化产业”概念出现的时刻，正是当报纸、广播与电影兴盛而成为支配文化形式的时刻，也是当电视被初步引入的时刻。

文化产业之所以发展迅速，从经济的角度看，有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重动力。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为，创意是人类文化定位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被不同形式表现。“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适用于“那些以无形、文化为本质的内容，经过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结合的产业”。这些内容典型的是保护著作权，可以采用衍生产品或者服务形式来表现。从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上任之后，大力提倡文创产业，多年来各国莫不竞相发展，不仅其产值超越传统产业，而且带动文化艺术与公民美学的涵养，因此被视为信息产业之后的“第四产业”。习近平说《泰坦尼克号》是美国1997年的一部大片，在中国此电影拥有3.2亿人民币的票房。但是当年的中国总票房才14.4亿人民币。一部电影可产出中国票房收入的五分之一。惊人吧？中国人共有500多家出版社，年总收入不及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Bertelsmann AG）一家出版社的总收入^①。你能说文化行业不挣钱吗？还有耐克、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苹果、三星等等，这些世界级品牌，在本国的产品研发却能在世界市场上长期盈利。因此各地方政府都希望透过文化产业的推动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自觉。

二、左营城隍文化活动

传统城隍庙布局以古代行政建制为依据，体现中国文化“阴阳”相互协调、共同治理的观念。城隍神负责的是精神道德层面的治理，例如城隍庙会有大算盘悬于山门上，意在“人算不如天算”，规训人们不要做不道德的事情；城隍庙中的对联，都是劝人为善的主题；同时地方官上任之前要先祭拜城隍神，也是对地方官日后行为的约束与威慑。由此，城隍庙可视为是城市的道德教化场。

^① 贝塔斯曼集团拥有176年历史，是《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媒体和服务集团。贝塔斯曼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电视（RTL集团）、图书（兰登书屋 Random House）、杂志（古纳雅尔 G+J）、服务（欧唯特集团 arvato）和媒体俱乐部（直接集团 Direct Group）等业务。年收入193亿欧元等于1518.2924亿人民币。数据取自：<http://www.bertelsmann.com>

高雄凤邑旧城城隍庙，简称旧城城隍庙，俗称左营城隍庙，庙址位于台湾高雄市左营地区名胜的莲池潭附近，主祀凤山县城隍敕封显佑伯，每年的农历5月12日为主神城隍爷之圣诞日。每隔4-6年举行一次兴隆里内外出寻绕境大典，是左营当地的一大盛事，“凤邑旧城城隍出巡”于2018年09月10日被登入高雄市定民俗。

城隍的观念源自道教，与儒教结合相互影响。最早记载城隍的是《周易·泰卦》：“城复于隍，勿用师”^①。最早祭城隍只筑土坛，无庙无像。“城隍”一词的古义为护城河。班固（32-92）《两都赋序》有过这种说法：“修宫室，浚城隍”^②。而以城隍作为神名，文献始见于李百药《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述，北齐大将慕容俨就曾于郢城拜城隍神祠而战胜了南梁敌军，为正史最早的明确记载。至唐代，城隍信仰在全国各地逐渐兴盛起来，城隍神身上“人”的气息也更加浓厚。一些著名士人、文人也热衷于城隍的祭祀活动，如张说（667-731）有《祭城隍文》，杜牧（803-852）有《祭黄州城隍祈雨文》，李德裕（787-849）曾建成都城隍祠。可见，在唐代中期，城隍信仰已经走出民间信仰的范围，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地方官府开始主持祭祀^③。到宋代时期城隍神信仰已经纳入国家祀典，北宋欧阳修（1007-1072）就有《祭城隍神文》^④。到了明代，城隍神信仰更达到极盛。

正如李丕煜《凤山县志·祀典志》所载：“城隍庙无专祭，而水旱、疾疫必祷之，致敬、宿斋必告之；故立之庙，使神有所凭依也。”^⑤ 设置城隍庙祭祀，大抵从道教成为民间信仰才出现。台湾城隍信仰源于大陆，但却发展出其地方特色，其大量移植到台湾是在清

^① 原指城墙乃用挖护城河的土堆积而成，如今城墙坍塌，墙土又复回护城河中，因此不可轻举妄动，劳师动众。此仅指出城隍一词的出处。

^② 【南朝梁】萧统主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页。

^③ 王云鹏《城隍信仰与潍县城隍庙》，《戏剧丛刊》2014年05期，第117-119页。

^④ 【宋】欧阳修《祭城隍神文》：“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职，不敢及他，请言城役。用民之力六万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众力方作，雨则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坏之。敢问雨者，于神谁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唯神有灵，可与雨语。吏竭其力，神佑以灵。各供厥职，无愧斯民。”见【宋】吕祖谦编《宋文鉴》第135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898-1899页。

^⑤ 【清】李丕煜《祀典志·庙·城隍庙》，《凤山县志》卷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45页。

朝时期，主要分为两个方式：一由清朝官方所主导，一由移民私祀，不过，基本上都被含括在王朝的国家祀典网络之中，而这个网络自明代建立以来，至清初已经十分成熟。明清时期中国城隍信仰的发展状况大体可分成制度化的祀典祭祀、制度外延伸的发展，具有王朝政权象征意义的城隍神，城隍爷是阴间行政兼司法官，排解阳世无法解决的纠纷，也判定往生者功过是非，提醒世人善恶有报，使民心得到慰藉，行为举止得以规范，颇有警世律民之意，就城隍爷在阴府的地位与职掌来说，饶富为阳间地方官分忧解劳之趣。

高雄旧城城隍庙奉祀主神“城隍尊神勅封显佑伯护国威灵公”，执掌兴隆内外里护境之职，配祀主神注生娘娘^①、福德正神以及班役功德爷、报司爷等 18 司。此庙创立基业于明末延平郡王郑成功时期，当时在埤仔头内遗留城隍庙一座，仅以草寮搭盖，简陋不堪。清代对于祭祀城隍的历史，根据李丕煜《凤山县志》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康熙十四年（1675），由清廷通令全国，将城隍爷的神牌合祀于山川坛中，并与“本县境内山川之神”、“风云雷雨之神”一同祭祀；到了清朝康熙五十七年（1718）凤山知县李丕煜有感于凤山县境内“独城隍缺焉未举”^②，遂倡导建庙，当时称之为凤邑城隍庙。根据记载祭物摆设有其规定^③，从其流程可见其祭拜采少牢之礼。

^① 俗称“注生妈”，又作“注生娘娘”，是闽南、潮汕和台湾一带最受尊奉的生育女神，主管妇女的怀孕、生产，是许多不孕妇女或怀孕妇女的信仰寄托。注生娘娘的造像，多是左手执簿本，右手持笔，象征其记录家家户户子嗣之事。

^② 《新建城隍庙记》：“国家先成而民后力致于神，非缓之也，民为神主，急其所当急；而凡百兴作，乃不至于缓所不可缓。凤山置县自荡平后，已余三纪；而秩官相继，亦不一人。予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南平移调斯邑。始至之日，而见厥土之已辟也，厥野之已治也，文庙之巍然在望，而美富之有其基也。虽未大备，心焉少慰。独城隍庙缺焉未举，斯民水旱、疠疾之害，孰为之除？盈宁寿考之祥，孰为之召？明有以治而幽无以赞也，又惕然虑之。夫国依于民，民依于神。今县之东北层峦迭嶂，何啻百丈之言言也；其西南澜翻涛激，何殊表海之泱泱也。苟匱神乏守，是谁之过欤？用是卜地于县治之左，鸠工庀材，作庙翼翼。自此，而读法有所，祇报、赛祷有其地，朔望行香，陟降俯仰，有其鉴观。是前人之所缓，正今日之不可不急者也。”见【清】李丕煜《祀典志·庙·城隍庙》，《凤山县志》卷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144-145页。

^③ 【清】刘良璧《典礼（祠祀附）·祭山川礼·陈设祭物图》，《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九，《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263页。

		枣	栗	
	爵	盐	藁鱼	羊
本府城隍之神	帛一	爵 羹	黍	稷
	爵		稻	粱

图 1：祭物摆设

其祭拜流程如下：

设城隍位于坛上，祭物羊一、豕一；陈设毕，通赞唱：“执事者各就位”，“陪祭官各就位”，“主祭官就位”。赞：“行一跪三叩礼，兴、平身。主祭官诣神位前，跪，三献酒，俯伏，兴、平身，复位”。读祭文，读毕，又一跪三叩，焚祭文并纸钱，礼毕^①。

其祝文云：“敢昭告于本县城隍之神曰：惟神妙用神机，生育万物；奠我民居，足我民食。某等钦崇上命，忝职兹土；今当仲春（秋），谨以牲醴，用伸常祭。尚飨！”^②。

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1787），台湾爆发林爽文事件，凤山县治受战火的波及，残破不堪，咸丰三年（1853）县治迁至新城（今高雄市凤山区），因县治迁移，左营兴隆庄县城遂沦为旧城，凤山县城隍庙一度称为兴隆城隍庙；到了嘉庆五年（1800），知县吴兆麟在新城（今凤山区）凤仪书院旁另建新城隍庙^③，而凤山县城隍庙因位于凤山县旧城，遂更名为旧城城隍庙。此后，历经清乾隆五十

^①【清】刘良璧《典礼（祠祀附），祭厉坛礼》，《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九，《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303-304页。

^②“城隍无专祭，而水旱、疾疫必祷之，致敬、宿斋必告之：故立之庙，使神有所凭依也。邑未有设，康熙五十七年，知县李丕煜捐俸鼎建；在兴隆庄文庙之后，而隶于右焉。”【清】李丕煜《祀典志·庙·城隍庙》，《凤山县志》卷三，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湾方志汇刊》第5册，原住民委员会出版，2004年，第44页。

^③庙中有汤大奎因林爽文事变殉职的“忠节流芳”碑，见【清】卢德嘉纂辑《凤山县采访册》，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湾文献丛刊》第73种，历史博物馆出版，2007年，第362页。

八年（1793）凤山儒学吴策勋^①、清咸丰六年（1856）陈大奎及1946年内惟李天辉，左营谢耀麟等曾三度重修。到了1962年，各方信徒日渐增多，庙宇信徒鉴于城隍庇佑乡民，但年久失修导致有失庄严和有碍观瞻，决议拆除重建，历时7年，于1968年完工。在此次重建过程中有许多文物被遗弃，部分文物被当时的木匠蔡德明先生收集保存下来，后成立文物馆保存这些珍贵的文物^②。研究者曾接受高雄市文献委员会委托记录这批珍贵文物，希望进行数字化，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这批文物。根据《风俗志》记载：“每年春季，迎天后，曰进香……夏仲，迎城隍，曰出巡。”^③不同于妈祖进香，城隍是出巡，因此旧城城隍爷，每逢农历5月12日圣诞日，出巡兴隆内外里13处角头起源于“兴隆内外里13宫庙巡狩绕境”活动，本身并无定期香科，至今仍为高雄左营庙会中重要活动项目。

表 2：13 宫庙庙名、创见年代、主神^④

庙名	创建年代	主神
左营元帝庙	乾隆年间	玄天上帝
左营丰谷宫	1924	神农大帝和天上圣母
左营店仔顶慈德宫	嘉庆年间	妈祖
廊后北极殿	康熙五十八年 (1719)	玄天上帝
埤子头镇福庙	嘉庆年间	土地公
新庄子青云宫	嘉庆年间(1804)	保生大帝
新吉庄北极殿	1949	玄天上帝
覆鼎金保安宫	咸丰元年(1851)	中坛元帅

^① “在旧治北郊（兴隆），县西15里，屋15间，庙租15元。”见【清】卢德嘉纂辑《丁部·规制·祠庙·城隍庙》，《凤山县采访册》，第182页。

^② 邓文龙《高雄有关民俗与文物普查》，高雄市文献委员会，2007年。

^③ 林焜熿《金门志》卷十五，《风俗记/杂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第396-398页。

^④ 数据取自：邓文龙《高雄有关民俗与文物普查》，2007 高雄市文献委员会与相关寺庙登记整理。

内惟镇安宫	乾隆元年（1736）	王爷
内惟青云宫	道光年间	保生大帝
龙目井龙泉宫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天上圣母
菜公丰谷宫	1933	神农大帝
洲仔清水宫	1938	清水祖师

迎神活动源于为求振兴商况的情形相当普遍，它提供了迎神活动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获得官方的支持，左营城隍庙会活动一直到皇民化运动之前都是相当活跃的，虽然日本政权并不积极利用城隍信仰的神道设教功能，但却依赖城隍庙会活动带来的商业利益，这些经济功能有助于活络地方商况，而总督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增加不少，因此在皇民化运动之前，官方非但不加以禁止，甚至大力鼓吹。根据 1918 年台湾日日新报纸的记载：

台南厅下旧城，前清时代置凤山县于其中，本为热闹之区，自县衙移转凤山，遂自凌替。改隶后暂就振兴，该地原祀城隍爷以为境主，香火素盛，例年于 5 月中不过连日演戏庆祝神诞而已，而于迎神赛会则未也。该区长郑新芬氏……有鉴于数年迎镇南妈祖，号召四方观客，商况因之大振，故此次出为提倡，欲举行城隍绕境振兴地方。已定旧历 5 月 13 日即新历 6 月 21 日举行……^①

其它如下表所见高雄的商工会、高雄实业新兴会、高雄实业协会等也配合城隍庙祭典办理各项活动，内容也十分多样化。

^① 《台湾日日新报》，1918 年 6 月 17 日。

表 3：1933-1935 高雄商工会举办城隍“庙会联合廉卖会”^①

会名	时间	相关配合活	参加商家数目	余兴活动
高雄商工会	1933.6.1	城隍庙祭典	n/a	西子湾拾蛤、寻宝、美人表演
	1934.6.1	城隍庙祭典	n/a	艺妓商店访问赛跑、烟火
高雄商工会、高雄实业新兴会、高雄实业协会	1935.6.8	高雄港祭、城隍庙祭典	50 余家	迎金比罗神 ^② 、游泳比赛、施放烟火、艺旦、短艇比赛、土产品展、摄影展

(一) 准备工作

迎城隍活动协助和鼓励沟庙及小区成立阵头、迎辇团、锣鼓队外，也鼓励民间企业认养阵头，提供体验宗教文化，使各小区宗教庆典活动更加活泼生动，展现不一样的宗教文化艺术嘉年华会。企业参与认养一、两个活动，并与本地企业相互配合及建构认养，让更多企业投入认养与赞助行列。

为积极协助文创产业推动，鼓励年轻人动头脑投入文创，降低营销风险，可规划美食地图^③或办手礼，让餐饮商家更有意愿参与，协助商店营销，带动地区的美食，汇集观光及活动人气。

学术机构在迎城隍活动配合有传统戏曲、民俗技艺团邀演、设置民俗艺阵博物馆，通过观赏表演的同时也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下去，对于举办活动更具有意义。而迎城隍文物调查、布展

^① 数据取自：赵佑志整理，《日据时期台湾商工会的发展（1895-1937）》，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第167-175页。

^② 位于日本香川县的金刀比罗宫，自古就以“赞岐的金比罗”之名为人熟知，是一个海洋之神。

^③ 邓文龙《高雄市传统文化名店的调查》，高雄文献委员会，2008年，第72页。

和相关艺阵资料收集记录应保留下来，均是珍贵的闽南文化资产，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向下扎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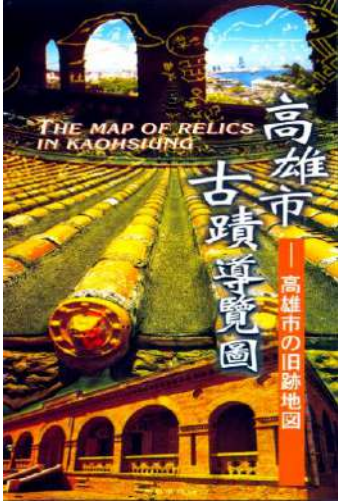


图 2: 古迹地图



图 3: 观光地图

(二) 绕境路线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 2008 年的城隍绕境为案例（如下表 4），在时间上也与传统的时间有很大的不同，此次分为夜巡、日巡，出寻绕境的范围从左营区至鼓山区、盐埕区再到三民区最后回到左营区，共跨越高雄市四大辖区，四辖区内的 13 所宫庙共同参与，展现出教化人心、济世助人、安定社会的功能。此出寻绕境不只限于一庙一区的信仰区域模式，出巡路线甚至扩展至高雄历史博物馆，加强城隍爷巡视的区域与民众之参与，具有特殊的民俗意义。城隍巡安游行队伍，依古制由红彩、城隍迁治纪念旗前导，依序是报马→长老→路关→大旗令号→开路大鼓→范将军→谢将军→驾前灯→旗牌→十二班班头→大锣→扫角→火签→大刀→炼枷→夹枷→藤条→板枷→大吹→凉伞→炉主→轿班，连同随香信众前后拥簇着“城隍”金身，展开长达近几天巡安。



图 4：城隍巡图

(数据来源：旧城城隍庙简介)



图 5：出巡活动绕境图^①

表 4：2000 年绕境路线^②

农历 11/23	城隍庙→埤仔头街→（右）胜利路→（左）左营大路→鼓山路→龙泉宫→临海二路→鼓波街→代天宫→滨海一路→上桥→（右）建国四路→武圣殿（午餐）→新丰宫→大仁路→三山国王庙→大公路→沙多宫→霞海城隍庙→寿山宫→文武圣殿→北斗街→七贤三路→兴华街→河西路（历史博物馆），晚餐。
夜巡	大勇路→（左）五福路→（左）中华路→（左）九如路→九如路桥下右安营
11/24	内惟（龙泉宫部落）用午餐→青云宫→镇安宫→安营→晚餐→阵头会演

^① 数据取自：凤邑旧城隍庙《凤邑旧城隍庙庚辰年出巡绕境》，凤邑旧城隍庙，2008 年。

^② 数据取自：凤邑旧城隍庙《凤邑旧城隍庙庚辰年出巡绕境》，凤邑旧城隍庙，2000 年，第 62 页。

11/25	镇安宫（早餐）→翠华路→（右）荣华路→（左）华夏路→新庄青云宫→午餐→北极殿→鼎金保安宫→安营→晚餐→阵头会演
11/26	保安宫（早餐）→菜公丰谷宫→风景管理所→午餐→洲仔清水宫→左营绕境→晚餐

每次绕境路线不同，如 202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 月 2 日，举行“高雄市定民俗——凤邑旧城城隍出巡”庚子年科出寻绕境。先锋官“覆鼎金保安宫中坛元帅”。

驻驾地点：第一天燕巢援剿右神元宫、第二天蚵子寮通安宫、第三天屏东东港东福殿城隍庙、第四天红毛港朝凤寺、第五天内惟青云宫、第六天新庄子青云宫。

（三）相应活动

从表 5 中可以发现，此次活动除了原本的庙会传统活动外，还增加许多精采的艺术活动，例如：攻炮城活动、民俗技艺嘉年华会、皮影戏、歌仔戏、古迹导览、城隍庙文物展等。由于活动的多样性且居民多半认同本活动和其文化遗产的功能，虽然对于增加个人收入无明显帮助，但为地方带来良好影响，使居民深以地方为荣。且信仰范围会因地方参与的人数而扩大绕境的路线，原先没有参与绕境的地区与宫庙（13 宫庙），后来陆续加入。因此藉由城隍爷出寻绕境活动，配合地方文史特色，使信仰、民俗、文化相融展出新面貌，丰富高雄市的文化内涵，充分呈现了海洋都市的旺盛生命力。

表 5：凤邑旧城城隍庙相关活动^①

日期（农历）	名称	时间	地点
11/19	开幕典礼	14:0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① 数据取自：凤邑旧城城隍庙《凤邑旧城城隍庙庚辰年出寻绕境》，凤邑旧城城隍庙，2000 年，第 63 页。

	攻炮城活动	14: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19-11/22	文史古迹导览活动	9:00- 11:00 14:00- 16:00	重要景点 ^①
11/19-11/25	民俗技艺嘉年华会	每天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20	东华皮影戏团皮影戏	19: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21	南北坊古典木偶戏团	19: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22	明华园歌仔戏 (二团)	19: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23	明华园歌仔戏 (二团)	19: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24	明华园歌仔戏 (二团)	19: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25	明华园歌仔戏 (二团)	19: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1/26	明华园歌仔戏 (正团)	19:30	城隍庙 庙前广场
12/5-2/18	凤邑旧城城隍庙 文物展 ^②		高雄 历史博物馆

^① 城隍庙→拱辰井、镇福社→北门（凤山县旧城）→慈济宫→春秋阁→旧孔庙崇圣祠→左营元帝庙→孔庙，上面重要的文化景点。

^② 邓文龙《高雄有关民俗与文物普查》，高雄市文献委员会，2007年。

在 2008 年庙方办理全国城隍大会师的活动，据说此次会师是奉左营城隍对现今社会“太多纷扰”所下的旨意，特别邀请全国各地的城隍共同前来会师，从该年一月一日开始一连 6 天，在高雄地区绕境，最后一天更邀请各地的城隍庙神尊一同到左营。城隍等同于地方最高首长，这场活动也算是全国地方首长的“大集合”，从原先 60 几间庙宇与会，到了活动当天增加到近 80 间，从早寻绕到半夜，绵延不绝、壮观华丽。



图 6：全国城隍大会师



图 7：人山人海



图 8：等待城隍保佑的民众



图 9：驳笈



图 10：算盘祝愿饼



图 11：七爷八爷



图 12：日巡神



图 13：夜巡神

表 6：2008 年出巡期间各项文艺表演^①

2008 年 12 月 29 至 2009 年 1 月 6 日各项文艺表演：			
日期	名称	时间	地点
12/29	龙华初中—醒狮、热舞、管弦乐、陶笛、拉拉队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2/30	立德初中—吉他演奏、直笛演奏、直排舞、热舞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2/31	内惟小学—狮阵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1	福山初中—手鼓演奏、舞动奇迹、说唱、舞拉拉、火球舞台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2	狮湖小学—跆拳道、吉他、小天使拉丁舞、长笛、武术击、创意口琴、小提琴、二胡、直笛、陶笛、热舞表演艺术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3	新庄小学—舞狮、跳鼓阵、扯铃、跆拳道、直笛、陶笛、街舞、热舞、魔术、说唱艺术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4	左营初中—长笛、陶笛、热舞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5	旧城小学—舞狮、舞蹈、创作舞、小提琴、相声、陶笛、直笛、扇子舞、童军舞、弦乐团四重奏	19:30	城隍庙前广场
1/6	烟火燃放	19:30	旧城小学前公园

城隍大会师，不仅有壮观的场面，更有别出心裁的表演让大家共襄盛举（如表）。从中可以发现两次绕境活动的不同，其他的文化活动主要是职业的团体表演，如皮影戏、木偶戏、歌仔戏为主，

^① 参考数据取自：左营旧城城隍庙网站 <http://www.taconet.com.tw/citygod>，2009 年 8 月 5 日检索。

但到了 2008 年，则是辖区内初中小的表演为主，从下表可以看出，表演的内容和其意义也不同，虽然两者均是表演性质，但前者着重表演，后者却以初中小学生在表演中所得到的文化学习和文化传承为重点，颇值得注意与研究。

表 7：表演类型与参与学校

类型	参与学校
传统性表演一：舞狮	龙华初中、内惟小学、旧城小学、新庄小学
传统性表演二：跳鼓阵	新庄小学
传统性表演三：相声	旧城小学
传统性表演四：扇子舞	旧城小学
传统性表演五：二胡	狮湖小学
传统性表演六：扯铃	新庄小学
传统性表演七：武术击	狮湖小学

另有西式的表演类型如下表：

表 8：表演类型与参与学校

类型	参与学校
音乐表演：口琴、小提琴、直笛、陶笛、弦乐团四重奏、手鼓演奏	龙华初中、立德初中、福山初中、狮湖小学、新庄小学、左营初中、旧城小学
舞蹈表演：拉拉队、直排舞、热舞、拉丁舞、街舞、童军舞	龙华初中、立德初中、福山初中、狮湖小学、新庄小学、左营初中、旧城小学

(四) 学校团体得参与

鼓励增加无形资产方面的宣传单位，让更多人了解无形资产。扩大邀请更多的小区或学校参与了解无形文化资产，同时也增加对小区的认同与重视。尤其是本校文藻外语大学协助、训练寺庙外语导览，来自不同地方的大学生可以通过此次的活动增加其更多的知识，扩展其更多元的事业。

(五) 衍生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

1. 日用系列商品

木质明信片（二款）、迎城隍杯垫组（三款一组）、手炼（男女款）、冰箱磁铁（三款一组）、亲子 T 恤（一款二色）、有求必应隔热垫组（二款一组）。



图 14：木质明信片、T 恤



图 15：手链、护身挂饰、毛巾

2. 公仔系列商品

城隍公仔系列（共五款）、城隍公仔造型毛巾、城隍公仔笔筒。

结论

(一) 结论

台湾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生命之源和生存的土壤，对文化与经济产生的影响。以高雄左营城隍文化传承为例，通过各种民俗、文化、观光活动，寓教于乐，具有节庆活动的趣味性与教育性，使民众体验到当地节庆的意涵，营造出体验式的情境，增强其对当地乡土的情感。再者，结合经济产业与文化传承的价值，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弘扬传统文化，紧跟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对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本文的城隍绕境祭典是高雄地区特殊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它虽不如台湾台中地区大甲妈祖绕境有名，但它结合高雄市乡土祭祀，融入艺阵、戏曲表演，是汇聚全民共享迎神、喜庆、群集娱乐的重要节日，也是小区乡土艺术展现的最佳舞台。2000年和2008年两次举办的形式与文化内容有不同之处，第二次的形式表现着重于市区内小学的参与，这是文化深根很好的表现。民俗文化最核心的一部分，具有文化、历史、社会、艺术等多层含意。随着社会变迁与政府的文化行政提倡多元文化并蓄，通过小区总体营造、一乡一特色、鼓励文化产业化等政策的推动，当代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民俗节庆活动呈现一方面寻根复古，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新的节庆发展出多元的艺术文化发展观，一方面引进外国的文化表演团体，一方面刺激与培养本地的文化表演团体，在相互观摩中提升文化内涵与文化的水平。

本文在人、事、物方面，归纳无形文化资产、民俗节庆文化活动存续的动力包括：乡土活动、创艺传承、地方生活、精神价值、生产事业等因素。但是如果过度商业化运作，会逐渐丧失民俗节庆传习艺术的原味，也使得文化活动弱化了永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是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总之希望更多的学者投入文化产业研究，加强传承传统文化艺术，结合现代体验，发展出兼具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二) 建议

不可忽略的是人文艺术的美感和社会发展的理性价值，无论如何添加创新元素，它仍是文化生态绵延不断的原动力。高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节庆活动在文化产业化的潮流中，可以持续发展。期待通过参与了解追溯民俗的传统因素，融入现代生活，共同开创兼具吸引世人关注，又能令人回味无穷的美感体验与享受。

1. 强化小区的参与

这是节庆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如何结合文史观光协会、地方餐厅、环保义工、出租车等，让节庆成为小区营造与参与的成果，各单位互动呈现一种有机的结合。由于表演者或观众都来自民间，因此文化活动的能量无疑也都在民间，且须与地方产业相互激荡植根。

2. 创新的概念

台湾“北天灯、南蜂炮”非物质遗产盛名远播，近年来也逐渐享誉国际。虽然新北、台南市政府不断在每年的活动上推陈出新，希望制造新鲜感，但活动要有生命力必须要能够长大。如贡寮海洋音乐祭一直维持非主流音乐创作精神，从不曾为了吸引群众而找来主流明星，但为了变化，慢慢开始邀请外国摇滚团体，或加入电影音乐等元素，保有固定的传统（非主流音乐），再加上适度的创新，让海洋音乐祭历时多年而不衰。

3. 长期规划

根据相关研究指出，国外重要节庆都有稳定的策展团队及长期规划，想要去看爱丁堡艺术节、亚维侬艺术节（Festival d'Avignon），的各国观光客，一年前就可以了解节庆的内容与重点，并安排相关行程。相对于国内筹备时间短，再仓促安排节目推出，因此每年参观的真正“外国”游客仍屈指可数，传统节庆活动再热闹，现阶段仍是“内需市场”。如何走向国际是需要更努力的地方。

责任编辑：陆思麟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Festivals: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Town God of Zuoying

Deng Wenlong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bstract: The heritag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e is the value which the UN claims that they must protect. Festivals are the pleasures of life,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another aspect of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creates a multi-win situation. Through many years of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es about the heritage of intangible culture, the author take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Zuoying Town God as the topic of this conference paper to emphasiz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intangible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words: Festiv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1950 和 1960 年代香港崇基学院 与东南亚华人高等教育

梁勇*

摘要 1950 至 1960 年代，香港有多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专上学院，是海外华人学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前往就读中文高等院校的另一选择，这是教育史所忽略的一页。崇基学院是招收最多海外华人学生的香港中文专上学院，约占校内总学生人数的 10%，主要来自东南亚，以马来西亚成立前的马来亚联合邦、北婆罗洲、砂拉越、新加坡为主。崇基学院把培育海外华人学生定为重要政策，并与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和北婆罗洲教育司建立合作关系，香港也有组织资助这类学生来港学习，不少例子证明学生毕业回到原居地后有所贡献。本论文为早期港马教育交流补充了新资料。

关键词 崇基学院 海外华人高等教育 港马教育交流
岭南大学

引言

崇基学院是 1951 至 1963 年间香港的一所私立中文专上学院，开设相当于大学程度的课程。自 1963 年起，崇基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学院，直至今日。崇基学院的创立，旨在继承原设中国大陆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教育传统，其中以继承广州岭南大学的传统为主，显著的一项便是对其“华侨教育”的承传。1956 至 1963 年间，崇基学院积极招收海外华人学生，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包括马来亚、砂拉越、北婆罗洲（North Borneo，1963 年改称沙巴）、新加坡、泰国，以及 1963 年后的马来西亚等，使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和台

* 梁勇，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客席讲师。Email: courageleung@gmail.com

湾以外，华人高中毕业生升读中文高等院校的另一选择。本文主要探讨崇基学院的招生策略、华人学生的来源和比例、东南亚教育机构的配合、学生回国后对当地的贡献等。

“华侨”指“旅居国外的中国人”^①，清末、民国时期的广州岭南大学使用“华侨教育”一词并无不妥，但把1950至1960年代的海外华人均视为华侨并不完全恰当，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崇基学院校方依然根据传统通称“华侨教育”，本文引用时会沿用此词，行文时则称华人或华裔教育。

一、崇基学院创立的背景及目的

1951年10月，崇基学院在香港创立，其目的在继承清末民国以来在中国大陆创办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教育传统。这十三所大学是岭南大学^②、东吴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十三校学术地位不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贡献。

1951至1952年，中国政府实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政策，全面调整全国高等院校，上述十三所基督教私立大学全部停办，其院系并入各所公立大学。基于此，留居香港的原十三校教学和行政人员议决在香港创建一所继承基督教大学传统的高等学府，崇基学院因而成立，“崇基”^③意指“崇奉基督”，表明它是一所基督教学院。崇基学院的三名创办人均来自过去的基督教大学，首先提出创校的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④是前岭南大学校董会成员和协和神学院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60页。

^② 岭南大学1888年创立于广州，初名格致书院，1952年停办。1967年以岭南书院名义复校于香港，1999年在香港复名岭南大学。本文涉及的是广州岭南大学，而非香港岭南大学。

^③ 校名“崇基”由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校长胡素贞命名，她是香港第一个女博士。

^④ 何明华（1895-1975），生于英国纽卡素，圣公会教徒。自1932年起长期在中国工作，担任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主教。此外从事教育，为岭南大学学生讲授“实践神学”课程，并在二战后出任该校校董。1951年，何明华出任圣公会港澳教区会督（即主教），长居香港，除宗教和慈善工作外，也热心教育，参与创办崇基学

特约讲师，校董会主席欧伟国^①是前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1946-1948），首任院长李应林^②是前岭南大学校长（1938-1948）。此外，原十三校教职员遍布崇基学院的各个教学和行政单位，不少身居要职。因此，崇基学院（以下简称崇基）继承了不少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大陆的传统，其中一项便是广州岭南大学的华侨教育传统。在香港的高等院校中，崇基在这方面的实践最为突出，招收了不少海外华人学生，其中以东南亚地区占多数。

二、广州岭南大学的华侨教育

崇基创校宗旨明言要继承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办学传统，早期校方刊物开宗明义便说：“真正讲起来，崇基学院是继承过去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大学的工作，并希望能继承他们既往一切优良的传统。”^③可是，所谓继承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传统，显得颇为笼统，校方也没有具体定义其内容。综观而言，最明显的是对宗教的重视和实践基督教的服务精神，前者体现于校牧处的设立、学生周会时的宗教仪式、在必修科“人生哲学”中注入基督教教义等；后者证之于学生开设免费平民夜校、参与反对渡轮公司（天星小轮）加价行动等。宗教和服务精神可谓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乃至大部分基督教学校的传统。

崇基不可能继承十三校的一切，具体来说，崇基主要继承的是广州岭南大学（以下简称岭大）的传统，因为崇基的创办人、各单

院和多所中、小学。1966年，何明华退休返回英国，1975年逝于牛津。

^① 欧伟国（1899-1959），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在香港就读中学，191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其后穿梭港沪两地，先后担任香港先施公司秘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襄理、香港广东银行司理等职。本职以外热心教育，出任岭南大学上海分校（中、小学）首届校董，1946至1948年间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其后定居香港，1950年代出任香港太古公司副总经理，同时从事教育，参与创办崇基学院，1959年逝世。

^② 李应林（1892-1954），中国现代教育家。幼年就读于澳门灌根书塾，后赴广州就读中学，再赴美国留学，1920年毕业于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1938至1948年间担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领导岭大三迁校园。1951年，李应林移居香港，参与创办崇基学院，担任首任院长，1954年在任内病逝，由欧伟国暂代院长职至1955年1月。

^③ 《崇基十年》，崇基学院，1961年，第1页。

位领导人、行政和教学人员大多来自岭大，除了前面提到的倡办人何明华和首任院长李应林外，还有注册主任谢昭杰（前岭大总务长）、创校顾问和第三任校长容启东^①（前岭大理工学院院长）、副院长庞德明^②（前岭大历史——政治系副教授）、经济及工商管理学系主任麦健增（前岭大经济学及工商管理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曾昭森（前岭大教育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卢宝尧（前岭大副教授）等。人事影响校政，当时崇基就被视为“广州岭南大学的缩影”^③。崇基确实继承了许多岭大的教育传统，包括校歌（采用岭大校歌原曲而填新词）^④、工读生制度、重视体育运动、一家亲精神、延续与美国岭南大学基金会的关系、华侨教育等^⑤。其中的华侨教育是岭大的重要办学特色，崇基继承了这项岭大传统，在这方面比其它香港高等院校突出，正是本文论及的对象。

广州岭大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华侨教育先河，格致书院（岭大最早名称）在 1888 年创校时已录取海外侨生，开学时录取了 30 名学生，其中 4 名是美国华侨^⑥。由于得到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地华侨的捐助，岭大在 1918 年设立“附设华侨学校”，旨在使“程度参差之侨生得以补习所欠缺之科目，以备转本大学之大学

^① 自第三任起，崇基学院院长改称“校长”，1977 年起复称“院长”。容启东（1908-1987）生于香港，其堂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名留学生容闳，父亲容星桥则为清政府首批选送美国留学的幼童。容启东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1937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任教于岭南大学。1951 年返回香港，担任香港大学植物学高级讲师。1960 年接任崇基校长，带领崇基加入香港中文大学。他是崇基校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领导该校共 15 年。

^② 庞德明（1911-1988），生于香港，在香港就读中学和加入教会。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其后任教于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1951 年返回香港，1953 年起任职于崇基学院，负责教学、行政和宗教事务。1970 年前往台湾，次年就任圣公会台湾教区主教，退休后返回香港，1988 年逝世。

^③ 江献珠《从崇基到联合》，吴瑞卿编《自在人生路——崇基人散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1 年，第 14 页。

^④ 岭大和崇基校歌之曲名为《安妮·莱尔》（Annie Lisle），作曲者是美国音乐家亨利·汤普森（Henry S. Thompson），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均有学校采用它为校歌之曲。详见梁勇《两岸三地六首同曲异词校歌》，《根本集》第七册，香港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文学硕士课程同学会，2019 年，第 72-73 页。

^⑤ 有关崇基学院继承的岭南大学传统，详见梁勇、曹天忠《香港崇基学院对民国时期广州岭南大学的传承》，《国文天地》2019 年第 34 卷第 10 期，第 57-66 页。

^⑥ 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 年，第 213 页。

及中学正科各级”。1918-1919年间，侨生入学者20余人^①。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程度参差，岭大华侨学校因材施教，采用分班教学，编配的教职员比本地学校多，而且均有华侨教学经验。侨生达到合适程度时，便获准转入岭南大学或其附设的中、小学继续学业。

岭大华侨学校设立后，侨生人数不断增加，1932年达到140余人^②。华侨继续捐建大楼，多座以华侨命名的建筑物相继落成，如张弼士堂^③、陆佑堂、陈嘉庚堂、马应彪护养院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侨生继续到广州岭大求学，1948-1949年度上学期的《岭南大学学业报告》（*Lingnan University Academic Report*）显示，该校共有128名来自马来亚、中南半岛和美国的华侨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约11%^④。此外，岭大更有教师亲赴马来亚作育华侨英才，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便是前岭大文学院院长庄泽宣。

华侨教育是广州岭大的特色，前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钟岐曾说：“岭南大学乃南方历史悠久的最高学府，办学成绩超著，尤其对海外华侨的子女，数十年来培育了大批热爱祖国侨生，学校本身亦负起侨务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⑤可见岭大在华侨教育方面颇见成就。

三、香港崇基学院的华侨教育

（一）定为政策

香港崇基学院的领导层和教职员大多来自广州岭南大学，自然使该校继承了岭大的华侨教育传统。自创校以来，校方一直致力招收海外华人学生，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高中毕业生。1950年代校方刊物《崇基校刊》已表明这点：

^① 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

^② 李瑞明《岭南大学》，第214页。

^③ 张弼士故居在马来西亚槟城，即“蓝屋”。

^④ “*Lingnan University Academic Report*”, First Semester, 1948-1949, p.3.

^⑤ 李瑞明《岭南大学》，第213页。

同时还希望容纳更多的本港以及南洋方面高中毕业的学生升入本院，为社会造就更多的通才和专才，使本院成为海外华侨的一所水平很高的高等学府。这是崇基创办的一贯目的。^①

可见校方把培育东南亚华人高中毕业生定为办学目标，是崇基的重要政策。代理院长芮陶庵（Andrew Tod Roy）也强调这方面的教育，具体指出重点地区和招收海外华人学生的好处：

相信崇基对造就本港及附近东南亚地区的青年有特别卓越的贡献，我提到“附近地区”，因为我们有从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及南方其它地方选拔来的侨生，使我们学生生活更加丰厚。相信他们对本港文化经济交流的远景，必然能起极有价值和有力的作用。^②

校方坐言起行，把政策化为实际行动，每年均招收不少海外华人高中毕业生。

（二）招生情况

崇基学院是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③的成员院校，主要采用中文为教学语言，但相对于其它中文专上学院，它也极为重视英语的运用，部分科目会采用英语授课，这对海外学生来说自是优势，使他们较容易融入新的学习环境中。

海外华人学生申请到崇基学习，需亲到香港参加入学考试，如因事未能前来，可由当地学校校长及教育机构保送来香港，崇基校方会根据学生在当地中学各年级的成绩加以挑选，并送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统一入学试委员会审查，经核准后，可免试入学。崇基录取的海外生

^① 《崇基校刊》1956年1月第7期，第1页。

^② 《崇基第六届毕业典礼代院长演词》，《崇基校刊》1960年7月第24期，第2页。

^③ 中文专上学校协会是1959-1963年间香港的教育组织，由三所成员院校组成：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该会负责协调三院的入学资格、师资水平、毕业资格等，务使三院的学术水平一致，同时向香港政府争取成为筹设中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在1963年成立，三院如愿成为其成员学院。

人数，按规定不能超过本地新生的十分之一^①，和当年广州岭大录取侨生的比例相若。崇基录取海外华人学生概况，详见下表：

表 1：崇基学院历年录取海外华人学生统计^②

年度	海外华生人数	占全校人数比例	来源地
1955-1956 下学期	5（转学生）	50%（只算转学生总人数比例）	新加坡、马来亚
1956-1957	46（含澳门生）	12.7%	-
1957-1958	45	10%	北婆罗洲、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
1958-1959	55	10.6%	北婆罗洲、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美国
1959-1960	48	9.2%	北婆罗洲、马来亚、新加坡、越南、印尼、美国、日本
1960-1961	69（含澳门生、非华人外国生）	13%	北婆罗洲、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砂拉越、泰国、印尼、菲律宾、日本、北非洲、美国等

^① 《崇基校刊》1961年7月第27期，第14页。

^② 各年度人数和来源地分别见《崇基校刊》第8期第1页、第11期第19页、第15期第14页、第18期第18页、第21期第18页、第25期第17页、第30期第20页、第31期第24页、第35期第3页、第37期第29-31页、第41期第29页、第41期英文版第84页、第45期英文版第50页。另见“*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65-1966*”，p.85。

1961-1962	58 (含澳门生、非华人外国生)	11.5%	北婆罗洲、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日本、美国等
1962-1963	3 (一年级)	1.2% (占一年级学生比例)	北婆罗洲、新加坡
1963-1964	68 (含澳门生、非华人外国生)	11.4%	-
1964-1965	71 (含澳门生、非华人外国生)	10.7%	马来西亚、印尼、日本、韩国、美国等
	8 (一年级)	4.8% (占一年级学生比例)	马来西亚、印尼
1965-1966	26	3.7%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印度、墨西哥
1966-1967	1 (一年级)	0.6% (占一年级学生比例)	马来西亚
1967-1968	12 (含澳门生)	1.2%	-

从上表可见，崇基从 1956 年起陆续录取海外华人学生，因为沙田马料水新校园在该年启用，面积扩大，设备增加，校园面积和住宿名额仅次于香港大学，既有空间容纳更多学生，也提高了对境外学生的吸引力。崇基录取的华裔生每年占总学生人数的 10% 上下，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亚、北婆罗洲、砂拉越、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来自该国的华裔生也不少。此外还有来自日本、印度、美国、墨西哥、北非洲的华裔生，可见崇基在海外华人中有一定的声誉，其学术水平得到他们的肯定，因此愿意送子女到香港进入崇基学习。崇基把澳门生也视为华裔生，这并不恰当，因为港澳同为中国人城市，不能视

为海外华人，在上表的统计中尽量减去澳门生的人数，因此每年的海外华生应占全校总人数的8-10%。

比较海外华生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选择，1950年代初较多选择到中国大陆升学，1953至1955年有近40,000人（包括各级学校）^①；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有所减少，这时期的侨生以因印尼排华而返回中国大陆的学生为主。台湾方面，自1957-1958年度起侨生人数明显上升，每年入读大专院校的人数在1800人左右^②。香港方面没有整体的数据，单看崇基，全校学生人数自1958年起才超过500人，跟中国大陆和台湾相比只属小型院校，却有50人左右的在读境外学生，实在是不错的成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自崇基在1963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海外华生逐渐减少，初期尚不明显，但1965-1966年度总数降至3.7%，1967-1968年度更完全没有录取华裔一年级新生，二至四年级只有12人，其中还包括澳门生，真正的海外华生更少。这是由于崇基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全面接受香港政府公费资助，需要优先照顾香港居民的利益，因此不能再像过往般自行其事。可是在另一方面，崇基神学院没有得到香港政府的资助^③，需要自筹经费，因此院务自主，神学院便能够录取较多海外华生，甚至可以超越10%的限额。1968-1969年度神学院共有16名学生，其中海外华生占3名，占总人数的18.8%，分别来自马来西亚和缅甸^④。可见培育海外华生是崇基的一贯政策，只要能自主，一定在最大程度上执行此政策。

（三）建立合作关系

为了让东南亚华人更了解崇基，校方与区内教育机构建立了联系管道，务使招生更为顺利。1956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朱运兴到日本东京出席联合国亚洲文教会议，回国时途经香港，顺道考察香港教育。崇基校方邀请他在3月12日来校参观，双

^① 转引自夏诚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两岸侨生教育》，《民国以来的侨务与侨教研究（一九一二-二〇〇四）》，第298页。

^② 向诚主编《侨务五十年》，台北侨务委员会，1982年，第246-247页。

^③ 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惯例是不以公费资助学校的宗教事务。

^④ 《崇基校刊》1968年12月第45期，第28页。

方讨论了港马两地教育课程，以及马来亚高中毕业生投考崇基的要求^①。此外，仍受英国统治的北婆罗洲，其教育司每年均保送当地高中毕业生到香港崇基升学，四年学杂费全由北婆罗洲政府供给。1959年11月23日，北婆罗洲教育司莫尔到访崇基，并会见在崇基学习的北婆罗洲学生^②。其后，北婆罗洲教育司视学官曾维国夫妇和奖助学金委员会主席凌士芬分别于1961年4月15日和6月2日到访崇基，与第三任校长容启东见面，并会见北婆罗洲学生^③。1962-1963年度，北婆罗洲政府颁发奖学金给18名当地高中毕业生，让他们到香港崇基升学^④。可见崇基与东南亚区内的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使招收华裔生更为顺利。当地政府的教育机构愿意与崇基建立紧密关系，是因为崇基自1959年起得到香港政府的经费补助，加入将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呼声很高，校誉日隆，因此愿意保送高中毕业生到崇基升学。

另一方面，崇基也得到香港民间组织的协助。香港青年商会自1956年起设立“海外奖学金”，每年挑选并资助优秀的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华人高中毕业生到崇基升学。每名学生四年所需费用约港币8,000元。该会负责管理和辅导这批学生，还负担他们的归国旅费。1961年的崇基毕业生中便有4名这类学生，均来自马来亚，两名来自庇能（今译檳城），两名来自吉隆坡；其中一名毕业于生物学系，3名毕业于经济及工商管理学系^⑤。

在1950和1960年代，香港不像中国大陆和台湾般有特定的招收海外华生政策，对外教育政策主要是提供奖学金给香港学生到英国或其它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又译共和联邦、大英国协）国家或地区升学，因此招收境外学生由院校自主，只要符合签证规定便可。1963年前，五所专上学院（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

① 《崇基校刊》1956年4月第8期，第3页。

② 《崇基校刊》1960年7月第24期，第25页。

③ 《崇基校刊》1961年7月第27期，第20页。

④ 《崇基校刊》1963年3月第32期，第20页。

⑤ 《校闻要志》，《崇基校刊》1961年10月第28期，第20页。

合书院、香港浸会书院^①、香江书院^②) 共同举办统一入学考试, 规例第十条为“港外区学生投考”, 订明: “凡年龄满十七岁在香港以外区域之中学毕业, 且持有证书, 经统一入学考试委员会认可者, 得报名投考。”^③规例简单而具弹性, 境外学生的中学毕业证书由五院入学考试委员会认定, 无须经香港政府审核。马来亚联合邦是英联邦成员国, 北婆罗洲仍受英国统治, 因此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两地学生无论在申请签证或学历承认方面都不是问题。加上崇基是香港政府承认的专上学院, 马来亚联合邦和北婆罗洲教育机构乐意与它建立合作关系自不为奇。跟中国大陆和台湾相比, 香港没有官方的优待海外华生政策, 主要由原居地政府和香港民间组织提供优惠。

(四) 海外华生成就

海外华生积极投入崇基的校园生活, 在运动方面表现突出。体育运动是崇基的强项, 校内运动设备优良, 1966年在校内建成全香港第一座标准田径运动场, 学生得以发挥运动专长。韩铄丰是来自北婆罗洲的学生, 他是业余田径运动员, 参加香港田径锦标赛 100 公尺短跑, 创出 10 秒 9 的纪录而获冠军, 获选代表香港参加亚洲运动会 (Asian Games)。不过由于他是北婆罗洲籍, 被召回原居地代表北婆罗洲出赛, 最后因病而未能参赛^④。

从崇基毕业的华裔生回到原居地后的发展都不错, 第六届毕业生 (1960 年) 郑应荃在新加坡崇侨银行总行工作, 连当磊任职于马来亚银行新加坡分行, 林宝根在马来亚哥打巴鲁 (Kota Bharu) 中正中学任教, 蔡景城在新加坡华文中学担任高中物理教师^⑤。1965 年的《崇基校刊》“校友动态”调查显示, 13 名崇基毕业生在马来西亚

^① 香港浸会书院在 1956 年创校, 1972 年改称香港浸会学院, 1994 年升格香港浸会大学。

^② 香江书院在 1949 年创校, 1994 年停办。香港浸会书院和香江书院均非中文专上学校协会成员院校。

^③ 《香港教育年鉴》, 1962 年, 第 78 页。

^④ 黄伟豪记录《资深教职员访问: 李小洛先生》, 《崇基校刊》1991/92 年第 70 期, 第 18 页。

^⑤ 《崇基校刊》1961 年 4 月第 26 期, 第 15 页。

沙巴州的中学任教，遍及亚庇（Kota Kinabalu）、斗湖（Tawau）、古达（Kudat）、山打根（Sandakan）等城市，其中一名由教师调任斗湖教育局。此外，一名崇基毕业生任职亚庇教育局^①。可见崇基达到了培育海外华人成才的目的，他们回到原居地后多能贡献所学。值得注意的是，崇基毕业生能够在刚成立的马来西亚任职教育局和教师，显然其学历受到承认，在 1960 年代，相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学历，香港学历的认可度普遍较高。

综观而言，香港崇基继承了广州岭大的华侨教育传统，两校对海外华裔生的教育宗旨一致，只是方法不同，岭大先让侨生进该校附设的华桥学校学习，然后按程度分配到岭南的大、中、小学继续学业。崇基则只办大专课程，直接录取海外高中毕业生到崇基升学。这是由于 1950 和 1960 年代东南亚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都有华文学校，加上香港和这些地区的学校均属英国教育体系，因此程度相若，在衔接上比较顺利。

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建校广州的岭南大学开华侨教育的先河，培育了不少海外侨生，得到了华侨的信赖。1951 年在香港创立的崇基学院以继承十三所原设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大学的传统为办学宗旨，当中以继承岭南大学的传统为主，其中一项便是华侨教育。自 1956 年起，崇基迁往新校园，规模扩大，设备增加，又得到香港政府经费补助，更积极争取加入香港政府筹办的香港中文大学，校誉日隆。借此良机，崇基积极争取海外华人前来就读，也确实吸引了不少境外青年，其中以东南亚地区的华裔生最多。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北婆罗洲教育司更与崇基校方合作，保送学生到香港就读于崇基，香港也有本地组织资助前来崇基就读的东南亚高中毕业生。不少学生归国后贡献原居地，有的任职于当地教育部门。1956 至 1963 年是崇基实践培育海外华裔青年的黄金期，使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

^① 《校友动态》，《崇基校刊》1965 年 6 月第 38 期，第 37-38 页。

以外，华人子弟出国接受中文高等教育的另一选择。自 1963 年崇基加入香港中文大学，从私立专上学院转型为公立大学的成员学院后，海外华生人数才显著减少。

责任编辑：杨金川

附录：附图五幅（全为作者自摄）



图 1：崇基学院校门牌楼

1959 年建成，后因扩阔道路而拆卸。
图为 2001 年按原貌扩大重建的牌楼。



图 2：原崇基学院校门牌楼楹联

牌楼拆卸后，原楹联安放于校园未圆湖旁。



图 3：崇基学院男生宿舍应林堂
建于 1958 年，今天为校内最旧建筑。



图 4：应林堂前李应林像
李应林为崇基学院首任院长（1951-1954 年在任），
前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1938-1948 年在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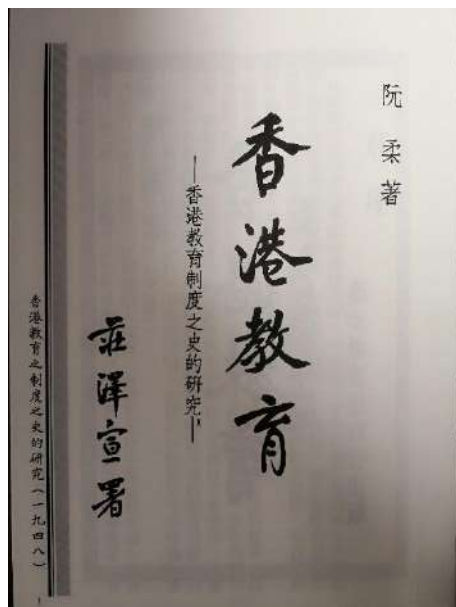


图 5：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庄泽宣题字

此书是岭大学生阮柔 1940 年的毕业论文，1948 年在香港出版，2020 年重印。庄泽宣 1947 年为此书题字并撰序，1950 年出任马来亚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

Chung Chi College of Hong Kong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Chinese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Leung Yung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re were certain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 with Chines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op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ese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in mainland China or Taiwan. This phenomenon is neglected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Chung Chi College recruit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among th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10% of Chung Chi's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Many of them wer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who were mainly from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North Borneo, Sarawak and Singapore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laysia. Educating overseas Chinese was the main policy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ollege cooperated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North Borneo in recruiting students. Some of them were funded by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Many studies have proven that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had contributed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after gradu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additional elements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educ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laysia.

Keywords: Chung Chi College, Educ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laysia, Higher Edu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